

· 报告厅 ·

年鉴的采访、编目、典藏与查阅

李金庆 林振锋 徐菽蕙

(厦门大学图书馆 福建 361005)

年鉴是一种汇编一年内重要时事文献以及统计资料,按年度连续出版的工具书。我国自从上世纪初有年鉴问世以来,到八十年代以后逐渐大量出版,如今已经成为纸质印刷型文献中的重要信息载体和知识渊藪。借助年鉴,人们可以方便地查找了解现代人物、机构、法规、统计数字和各学科、行业的进展情况。但实际上,年鉴的信息和知识功能却未能得到充分发挥,至于年鉴的组织与管理更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一、年鉴的题名与时间

一般情况下,题名有“年鉴”二字的文献是年鉴,否则不是年鉴,年鉴每年一卷,记载上一年信息,但实践中也常碰到特殊或不规范的情况。

1 年鉴的题名

目前,不少图书馆简单、直观地将书名标有“年鉴”二字的图书作为年鉴采访与组织管理,如此划分子操作,判断简便。特别是对于将年鉴独立划出专列采访的图书馆,可避免重复采访的错误。但是这样做把许多属于年鉴范畴的图书不作为年鉴管理,使这些图书难以发挥年鉴应有的功用。

事实上,除了以“年鉴”的书名出现外,不少含“统计资料”、“年度报告”或“统计表”、“手册”、“年刊”等题名的图书也是年鉴,也应纳入年鉴管理。例如,《世界知识年鉴》自 1936 年出版至今,其间

1953、1954、1955 和 1957 四卷以《世界知识手册》为名。

相反地,有的冠以“年鉴”之名的书并非年鉴,例如《中国小说年鉴》,实为小说选集。年鉴应基本上包括专文、发展概况、人物和机构、动态、统计资料、书刊选介、大事记和附录等栏目。有的年鉴栏目太少内容单一,或者内容繁杂未加概括,不便查检,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年鉴。如《中国作文年鉴》,结构残缺,不够规范。

2 年鉴的资料收集和出版时间

除创刊卷经常有往年的回溯资料外,年鉴收录的资料、反映的事件,时间范围一般限于上一年,例如,《广州年鉴》自述“以出版年号为卷次名称,2007 年卷主要载录广州地区 2006 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资料”。但是有些年鉴收录资料时间较乱,例如,国家统计局编的《国际统计年鉴》2008 卷于 2008 年 2 月出版,收录的统计资料横跨多个年份,包括:主要农产品产量(2006)、出口货物构成(2005)、能源储量(2004)、农业机械拥有量(2003)等。

大部分年鉴都每年一卷有规律地编辑出版,例如,《中国财政年鉴》自 1992 年创刊以来,十几年来每年一册。但是,有的年鉴编辑出版没规律,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年鉴》题名、出版周期和出版社频改,可谓混乱。如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年鉴》2002卷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年鉴》2003-2004合卷,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年鉴》2005年卷,由京华出版社出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年鉴》2006-2007卷。有的年鉴出版时间严重滞后,影响了年鉴的效用,例如,《中国音乐年鉴》2003年卷2006年才出版。

二、年鉴的采访

作为连续出版物的一部分,年鉴的收藏应和普通期刊及多卷集图书一样,力求连续性、系统性。但有的图书馆和资料室由于盲目采访,业务操作不规范,表现为馆藏年鉴缺期断档,复本不一,漏订、误订严重等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 盲目采访,没有规划

有的馆缺乏相应的年鉴采访计划和规范,或者政策朝令夕改,加之采购人员经常更换,无形中造成了年鉴采购的随意性和不连续性。盲目采访首先表现在采访缺乏针对性,不管年鉴内容是否适合本馆读者需要,内容是否有参考价值,随意订购;其次是被动采访,未能主动寻访与配套补缺;第三是零星采访,没有规划,对年鉴出版信息未能充分了解,势必造成年鉴的漏订,致使馆藏年鉴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第四是复本各年不同,无法配套。

例如某综合性高校馆随意订购专业不对口的煤炭工业年鉴和省外县市年鉴的个别卷册,这类年鉴学科针对性不强,亦非特色馆藏,连续订购浪费经费,只藏个别卷册更无价值。

2 分散采访,造成混乱

由于年鉴是有别于期刊、报纸的具有工具书性质的特殊的连续出版物,似书又似刊,有的申请书号,有的申请刊号,有的年鉴在不同时期采用不同的标准号,例如,《中国经济年鉴》1981年以来先后采用国内统一书号、ISBN、CN和ISSN。与此相联系,在征订途径方面,随着年鉴品种与数量的增多,有的从图书途径征订,有的从期刊途径征订,有的自办发行,有的同时从两个以上的途径征订。不少图书馆不但多个图书采访人员都可订购,而且期刊与图书采访人员各自从书刊途径办订,造成混乱,容易漏订或重订。

3 缺乏协调与综合考量

年鉴采购时不能孤立地考虑单种年鉴,除了从

内容上进行配套管理,还应从不同的载体、行业、地域、地域、文种及查检方法等角度思考相互的协调互补或替代。例如某些利用率不太高的年鉴,可让读者通过金报兴图等数据库查检,不必订购纸本年鉴。

年鉴订购还要考虑馆藏情况,决定是否补订及复本量。例如对于可订可不订的年鉴,已连续收藏多年的续订,只零星收藏一、二卷的停订。

4 信息沟通不畅

有的图书馆由于与读者信息沟通渠道不畅,造成采访人员无法了解读者需要什么年鉴;或者采访部门内部的年鉴采访信息没有及时共享,采访系统未能实时、准确地发布采访信息,也会造成漏订、重订。除了开展年鉴需求调研和本单位信息透明外,也要重视与兄弟馆的信息沟通,开展年鉴共建共知与共享。

要做好年鉴采访,首先应明确年鉴归图书采访或期刊采访,制定采访计划和操作规范。我馆年鉴独立分出,由专人负责采访,实行纲目采书模式向书商批发订,书商一旦找到我馆批订购清单上所列的年鉴或是纲目范围内的新年鉴,就通过邮件询订确认,随后发书。这样便于系统化专门管理,全面规划,避免重订、漏订。

三、年鉴的编目

年鉴编目工作较常出现的问题,有同书异号、书刊混淆,以及时间、主题标引错误等。

1 索取号前后矛盾,同书异号

索取号是图书排架和读者查检文献的主要依据,同书同号是保证文献科学组织和高效利用的前提,但有些图书馆的年鉴在不同年份取不同的索取号,造成读者在架上找书时,误以为缺期,这些年鉴也因此成为“死书”。这种情况是编目员标引不规范、查重不细心造成的。

由于编目员对有些年鉴更名、变化等情况了解不够,致使一些在时间和内容上前后连续的年鉴,仅仅因为题名稍有变化,在归类上完全不同。例如,《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从1991年起改名为《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由于文献主体未改变,分类号不发生变化,但有的编目员却另取分类号。

2 时间、主题标引错误

主题标引除了揭示内容,也有必要揭示时间和地点等信息,年鉴题名的年份和所反映内容的年份

不同,例如 2007 年卷的年鉴,一般是反映 2006 年的信息,所以时间标引应是“2006”,而不是“2007”,但不少图书馆的书目存在这方面错误。例如,有的图书馆将《中国内科年鉴》2006 年卷主题标引为: 606 @ a 内科学 @ y 中国 @ z 2006 @ j 年鉴,时间标引就不正确。

3 电子文献信息没揭示

近年出版的年鉴多附光盘,并注明光盘的正式书号或内部登记号,与纸本标准号不同。例如《中国财政年鉴》纸本刊号为 ISSN 1004-5740 2007 年卷所附光盘 ISBN 为 978-7-89992-203-3 此类信息要反映在 MARC 的 010 字段上,且不要与印刷书号混淆。

有的图书馆能提供电子版服务,就要在 856 字段著录电子版年鉴的文献地址,且标注的年份要和 905 字段的索取号一致。

4 书刊编目不一致

年鉴兼有工具书与连续出版物的双重特性,这种似书似刊的状况,导致有的馆将其作为图书编目,有的馆将其作为期刊编目,有的认为采用书号的按书编目,采用刊号的按刊编目,理论与实践均出现分歧。而有的馆没有原则,有时按书编,有时按刊编。笔者认为,年鉴通过 207、326 和 4——字段揭示其起止卷年、出版频率和刊物沿革信息,书目的期刊特性较突出,编目时如果按照连续出版物著录,既方便管理和检索,又能全面、准确地揭示年鉴发展变化的全貌。但不管是作为图书或期刊编目,都应尽量将信息详细著录,除了起止卷期和刊物沿革等信息外,不管是 ISBN、ISSN 或 CN 号,也都要在 MARC 中详细注明。

此外,编目时在头标区和 0——标识块、1——编目信息块也要对年鉴的文献类型、出版时间等做对应的著录。

四、年鉴的典藏

年鉴典藏环节的常见问题是典藏分散和书卡不符,以及集中或分散典藏不一致。

1 典藏分散、人为割裂

有的图书馆违背典藏规律,人为割裂同一种年鉴,同一套年鉴的不同时段分藏到不同典藏点,或者典藏时不考虑同一馆复本配套。北大图书馆学家肖东发教授几年前对北大图书馆馆藏年鉴作过调

研,并在“图书馆对年鉴资源的搜集整理与利用”一文中说过,北京大学图书馆年鉴“典藏过于分散。几乎每个阅览室、书库都有年鉴,而在品种和期上任何一处也不完整,这给内部管理和读者使用都带来极大不便。”

2 书卡不符

由于管理混乱,典藏部门对于年鉴的毁损、丢失、调拨、赠送等馆藏变化信息没有及时修改,图书贴错索取号或是乱架,因而出现“书卡不符”的情况。实现计算机管理的图书馆体现在 OPAC 的书目信息与实际藏书不符,出现有藏书但无书目记录或相关记录没有反映馆藏,有书目记录无藏书或藏书典藏点与书目反映的馆藏点不相符。书卡不符合会提高拒借率,造成“死书”现象。

3 集中与分散问题

如前所述,年鉴似书又似刊,大部分图书馆将年鉴作为图书典藏,有的放在普通书库,有的设立专架或专门的工具书阅览室,目的是方便读者利用。但在管理实践中,同一个图书馆不同年鉴典藏规则不一致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些年鉴放到专架或典藏在工具书室,有些却典藏到普通书库,而有些与年刊作为期刊放到过刊库管理。特别是同一年鉴的不同卷册分散到不同地方,影响了年鉴的正常使用。

笔者认为,无论采取集中或分散典藏,各图书馆对年鉴典藏应有明确的规则,并统一执行。从年鉴的特点及读者使用习惯看,放到过刊库会影响年鉴的使用效率,统一放到工具书室会提高其利用率。

五、年鉴的查阅

年鉴信息丰富,可满足读者多方面的信息需求。读者通过它不仅可了解国际国内大事和时事动态,查找学科发展的历史大事、最新动态、最新进展和准确详细的数字统计资料,还可以利用年鉴查找法规政策、当代人物生平和书刊论文线索等,尤其是由权威人士撰写的综述、述评等三次文献,参考价值极高。

年鉴对促进高校的教学科研起重大作用。科研人员在确定研究课题时,需了解课题的研究现状和今后的发展趋势,而专业年鉴集中、系统地反映某学科、某专业近年来的进展情况和研究成果,注重反映学科的新发现、新动向,对于科研人员选题、攻关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教师通过各专业年鉴中的政策

文件、专题述评、论著选介、统计资料、书目索引和学科发展综述等,了解学科发展的进展情况及有关的新资料、新观点、新成果,并把最新的信息、最准确的数字及时运用到教学、教材中去,将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年鉴对于图书馆工作也大有帮助。年鉴可帮助采访人员了解书刊出版动态建构优质藏书体系;帮助分类人员了解新学科知识,进行科学分类;帮助书刊借阅流通部门熟悉书刊,做好读者工作;其信息密集且易于查检的特性可帮助咨询人员正确迅速地解答读者咨询。

在年鉴的开发利用方面,当前的主要问题在于宣传不够,往往局限于读者查询,被动服务。图书馆应对年鉴开展深层次上的信息揭示、宣传、导航和咨询工作,年鉴随书光盘数据及时上网,特别是做好功能互补年鉴的配套开发。

在年鉴订购、典藏与利用过程中,应有意识地组

· 阅览室 ·

合一些功能互补的年鉴,以完善它们的功用。有些书名虽无“年鉴”字样,但分析其特征,可归入年鉴类管理开发。

如《上海经济年鉴》首卷出版前,曾出版《上海经济 1949-1982》和《上海经济 1983-1985》。江泽民在 1983-85 卷序言中写道:“《上海经济 1983-1985》是《上海经济 1949-1982》的延续,它将与今后每年出版的《上海经济年鉴》相衔接,组成一部比较系统完整的上海地方经济史略。”这说明《上海经济》与《上海经济年鉴》有互补性。

又如,1986、1987 年《福建省农村统计资料》,1988 年《福建省农村经济统计年鉴》,1989 年以后的《福建农村统计年鉴》,1994 年以后的《福建农村经济年鉴》,上述这四种书不管有无继承关系,由于内容相近,时间衔接,其功能就可互补,可配套采访与管理开发。

《大家国学》书系之《唐文治卷》读后

荣方超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rongfangchao@163.com)

所谓“大家国学”者,前辈大师的修为,今日大众的国学养分也。

这是《大家国学》书系的编者对“大家国学”一词的释义。正因为是“大家国学”而非“国学大家”,因此,这不是一套名人传记类丛书。正如封面上的那一段文字所说:“在《国学热》经由电视讲坛途径进入百姓视野、传统文化过渡娱乐化,而国学常识却明显匮乏的当下,听听昨天的大师们怎么说,是一种补课,更是一种参照”,因此丛书的中心是“国学”,而非“大家”。

以普及国学常识为任的著述,就笔者所见,新近出版的便有曹伯韩所著《国学常识》(北京三联书店 2002 年版)、刘兆祐等编著的《国学导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孔祥骅所著《国学入门》(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邱璿友等编著的《国学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年版),以

及卞孝萱、胡阿祥主编的《国学四十讲》(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等,然而与这些著述不同的是,这套《大家国学》丛书把“人”作为读者了解国学、初识门径的入手点,借由二十世纪名家学者,“选择其关于国学、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学术等概论性、常识性的文字成一选本”,“以便于引导读者进一步了解、把握学者最基本的国学修养与学术思想”。因此,便有了《大家国学·唐文治卷》(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12 月版)的问世。

唐文治(1865-1954 年),字颖侯,号蔚芝,晚号茹经。江苏太仓人。近代著名教育家,文学家。曾在名师黄以周、王先谦门下学习经学,术业精进。清末进士,历任职外务部、农工商部,官至尚书。1907 年弃官从教,担任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民元以后更名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即交通大学前身)监督垂四十年。嗣后更勉力创办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自任校长,